關於「消息」

陳 安

去年我和另兩位同事先後退休後，我們留出的空位就都給凍結了，至今未曾補缺——經濟衰退竟也影響到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不久前收到的圖書館發來的電郵更說明此影響之深遠——有多名管理員最近被解僱了。此則電郵給我印象深刻，不僅因其內容，更因其結尾一句話：「這不是好消息，但是消息。」

其實，大家知道，這是壞消息，但公布消息者不願讓大夥兒太傷感，不願引起更多人朝不保夕的不安全感，而且因經濟蕭條造成減員裁人也確實是徒喚奈何之事，也就不去說什麼「壞消息」，而用「消息」這個中性名詞來替代了。

我們目前生活中的「消息」還真不少。某些人每周只要上四天班了，似乎是令人輕鬆的好消息，卻原來工資也少發一天，只能算是「消息」。某些人被勸提前退休，提前頤養天年、含飴弄孫，似乎是好消息，卻要少拿很多養老金，也只能算是「消息」。某些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只好繼續讀碩士、博士，這種深造機會應是好消息，但對沒有深造意願的學生來說，這只能是「消息」。

以上這些消息，儘管不是「好消息」，可還真算不上是「壞消息」，而至多是「消息」，令人無可奈何、哭笑不得的消息，一種由大環境、大氣候傳遞給你、你不能不接受的消息。

接到圖書館解僱人員消息的那天，我正在看一部電視劇，裡面有句台詞又使我浮想聯翩。劇中有一角色有親人失蹤，詢問公安機關有無失蹤者消息，公安人員答道：「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萬一有了被撕票之類的消息，那就只能是壞消息了。

我想，我們在生活中也真應該更多地企盼「沒有消息」，因爲沒有消息往往就是好消息。沒有飛機墜毀的消息，就是空中乘客都安全無恙的好消息。沒有地震海嘯的消息，就是沒有人被掩埋或席捲的好消息。沒有歹徒開槍濫射的消息，就是沒有人被無辜殺害的好消息。

我曾在報社工作過，常聽發稿人說「今天沒有什麼消息」，也即沒有什麼大新聞。這對好用黑體大標題的編輯或希望用大消息來增加銷售量的發行者來說，可能有點遺憾，但「沒有消息」，往往就是沒有大難，沒有大戰，沒有大屠殺，沒有大貪污犯，總之，無大事件，天下平安，——這豈非最大的消息，最大的好消息！

王魯雨的《北念草》

許定銘

王魯雨（一九一五——）是畢業於復旦大學的四川人，又名王立昭，戰時先後在四川、貴陽等地從事中等教育工作。建國後任重慶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並代理系主任，主要擔任外國文學的教授及研究，晚年發表多篇外國文學論文，其中以《論莎士比亞的悲劇》一文有獨特的見解，好評如潮。

王魯雨年輕時熱愛文藝，一九三四年起，以狂循、秦烽及本名在全國著名報刊發表作品，並結集《北念草》傳世。

《北念草》（重慶風月社，一九四四）是何劍熏主編的《風月叢刊》之一，土紙本，初版印三千冊，由重慶自力書店發行，三十二開本，薄薄的只有四十六頁，收《荒鄉之夜》、《杜鵑花》、《清涼亭及其他》、《荒漠之音》、《北念草》……等十三篇，都是些千餘字的抒情散文，全書不足三萬字。

從這十餘篇充滿淒酸苦楚的美文中，我們讀到的是一顆善良的心，接觸到的是一個從南方漂泊到北方苦旱大地的純潔的靈魂。在那些描述得像仙境般美好的大山小河中，除了散文詩的伊甸外，我們還常常感受到文字背後的：戰爭、血腥、死亡，及爲自由民主作的奮鬥。

我第一眼已愛上這本書，是深受那裝幀抽象的封面所吸引，原來那是廖冰兄的精品。

羹爛汝手乎

王兆貴

一次，戴卓爾夫人在官邸設宴。女侍者在爲客人分湯時，不小心把熱湯潑到了內政大臣的身上，這讓滿座賓客都很意外。這時，戴卓爾夫人首先想到的是這個闖禍的女孩子，她站起身來，趕緊走到這個女孩子身旁，拍着她的肩膀說，親愛的，這種錯誤我們每個人都會發生，千萬不要難過。待這個女孩子心理平靜後，她才去慰問那位大臣。戴卓爾夫人所以這樣做，是因爲她知道當時最窘迫、最難過、最需要撫慰的是這個女孩子。

近來翻書發現，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同戴卓爾夫人的舉動如出一轍的事例，在我國東漢劉寬的身上就曾發生過。一天，劉寬穿戴整齊正準備上朝時，被端羹的侍婢將肉湯潑到了朝服上。倉促中，劉寬神色祥和，非但沒有責怪的意思，反而緩緩地對手忙腳亂的侍婢說，肉羹燙傷你的手了吧？這便是典故「羹爛汝手」的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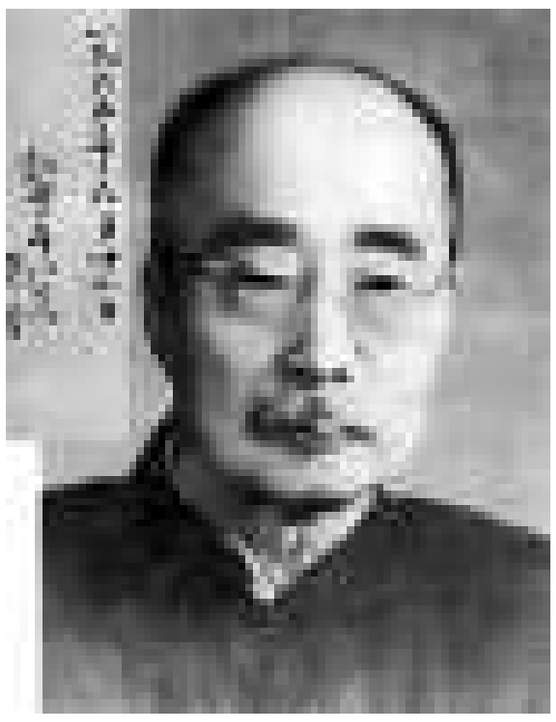
關中華陰人劉寬，人如其名，生性寬厚，漢靈帝年間，曾官至太尉。在他身上，類似這樣寬厚待人事例還有很多。一次，劉寬家裡來了客人，就派一個奴僕去街市沽酒。等了許久，那個奴僕才醉醺醺地回來。客人覺得不堪忍受，不禁罵了聲：「畜牲！」過了一會，劉寬擔心那位家奴因想不開而自殺，就派人到後堂去看慰他。並環顧左右說，奴僕也是人，罵他畜牲，還有比這更能折辱人的嗎？有個丟了牛的人，把爲劉寬駕轅出行的牛錯認爲是自家的牛。劉寬沒有辯解，便將那頭牛交給了他，自己步行回家。後來，那人找到了自己丟失的牛，便趕到劉寬府上還牛謝罪，請求處罰。劉寬說，世間相類似的物品，難免會讓人看錯，幸運的是你找到了自己的牛，並勞煩你把認錯了的牛給我送了回來，這有什麼好謝罪的呢？

劉寬於私下裡待人處事若此，在官場同樣仁厚寬恕，從不疾言厲色，苛責於人。屬下有了過錯，只以蒲草爲鞭，輕罰示辱而已；政務有了功績，皆讓給屬下；治下出現災異，每每引咎自責；巡視見了父老，輒以鄉情農事相詢慰；對少年弟子，則勉勵他們善事兄長。劉寬氣度寬宏大量，性情溫厚慈愛，海內聞風都尊他爲長者，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世風日臻淳樸。

睜開眼睛看看，與你同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太多，人際關係也太複雜；閉上眼睛想想，其實很簡單，算來不過是本人與他人的關係而已。在人際交往中，儘管許多人都以善良自詡，但當面臨利害衝突時，卻往往會本能地趨利避害尋求自保。我們對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些微不便，總是非常敏感，而對他人生活中遭受的災難卻往往缺乏感同身受的體驗。這說明，慈悲之心，雖然人皆有之，但爲善之舉，往往繫於一念。遇事首先想到他人、每每發自初衷的人並不多見。只有當善意源於自發、善行成爲習慣，視「難得如此」爲「本該如此」，「爲他人着想」才不會是良心發現的一時衝動，而是扎根於心靈中的主體意識和一以貫之的美德。

周作人的個性缺陷

郭宇一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

西方有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性格決定命運。這話雖然略顯絕對，但用來觀照周作人的一生，卻多少有些應驗。周作人學富五車，博學多才，成就頗高。雖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如果他一生處於和平年代，他多半會成爲受人尊敬愛戴的大學問家的。而他偏偏生於中國社會最動亂的年代，時代與環境的要求同他的個性相悖，換言之，他性格的弱點或者說缺陷在這非常的歷史時期被放大，對他的行爲產生了關鍵的影響。我們依據現有的資料對周作人個性的特點和弱點做一些客觀的分析，庶幾會感性地把握周作人的一生。

周作人個性中具有極大的依賴性。這似乎與人的天性有關。周作人自幼是一個乖巧、文靜的孩子。他的母親魯瑞老太太在周作人剛剛出生的時候，就發現這個孩子很安靜，很少哭鬧，就是肚子餓，也只是努着小嘴左右覓食，卻也不哭。老人家說他的性格和順，遇事很好商量，對人謙和。

這樣天生稟性，恰巧遇到了一位比他年長四歲的大哥魯迅，而且這位大哥又是那樣的有責任心，那樣的對這個二弟關愛有加，這自然就更加助長了周作人依賴性的形成。周氏兄弟之父周伯宜去世時，魯迅剛剛十五歲，周作人才十一歲，這兩個小兄弟從此便相依爲命，經歷了共同的人間冷暖及世態炎涼。中國社會的傳統觀念裡，長子，尤其像魯迅這樣的「承重孫」，在家族中所承擔的責任是很重大的，再加上他比患過天花、身體較弱的二弟要大四歲，而且魯迅又是那樣什麼事都敢於擔當的天性，這就自然地決定了只要兩人在一起的時候，什麼事情都由魯迅做主、魯迅出頭。周作人只要跟在後面就行了。在父親病重期間，跑當舖、請醫生、抓藥這些繁重瑣屑的事務，都是魯迅承擔的，周作人有了這樣一位可以依賴的長兄，凡事就更加不願出頭露面了。

在整個青少年成長時期，周作人每一步人生道路幾乎都是由魯迅爲他籌劃安排好了的，而且是大哥走到哪裡，他就跟到哪裡，大哥爲他鋪好了路，他順順當當地走過來就是了。他們先後到三味書屋讀私塾，先後進入南京水師學堂，先後留學日本，先後到北京住在紹興會館，先後在北京各大學裡教書，先後遷入八道灣胡同一起居住……周作人在日本與羽太信子結婚後，魯迅結束了自己的留學生活回國，他對好友許壽裳說：「你回國很好，我也只好回國去，因爲起孟將結婚，從此費用增多，我不能不回去謀事，庶幾有所資助。」這在魯迅自己，是做出了犧牲的，而周作人卻並未因此有過什麼負疚和抱歉的表示，好像認爲這是很自然的，大哥就應該爲他這樣做似的。周作人學成回國後，在魯迅的舉薦下，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遂延聘周作人爲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的編纂。魯迅甚至把自己整理出來的《會稽郡故書雜集》以周作人的名義出版。北京八道灣的住房，是魯迅南北奔波賣掉紹興祖屋，用這筆錢加上魯迅自己的積蓄及借貸買下的，辛苦經營修葺之時，周作人去了日本，房子可以入住了，他才攜着妻子妻妹回來，住進最寬大的裡院，而魯迅則住在兩院之間的陰冷的「罩房」。對此，周作人也沒有對大哥表示什麼感激之情，而且僅過了三年之後，就因爲兩人都不願透露的原因失和，逼得魯迅不得不搬出另租房子居住。

除了在生活、學習、工作上周作人處處依賴魯迅外，青少年時代在情感上心理上魯迅也是他最大的依靠。

一九〇二年二月，周作人剛剛考入南京水師學堂，在二、三號兩天的日記中他記錄了他們白天見了面，喝了茶，剛剛分別，晚飯後魯迅就又爲二弟送書來，一同讀書到半夜，大哥就索性睡在二弟處，第二天一早回去，下午就又盼着大哥再來，沒有等到，「歸而復作，燈光如豆，伴我淒清，對之淒然，」可以看出周作人對大哥感情上的依賴。

冷漠孤僻是周作人個性的另一個特點。在燕園凡認識周作人的，大都覺得此人一團和氣，淡泊靜雅，很少臧否人物，「和」中還帶有一點冷意，故不致與人過分親近。林語堂有一篇《記周氏弟兄》說：「周氏弟兄，趨兩極端。魯迅極熱，作人極冷。兩人都有天才，而冷不如熱……」冰心在回覆陳子善的信中寫道：「關於周作人先生，我實在沒有什麼話說，我在燕大末一年，一九二三年曾上過他的課，他很木訥，不像他的文章那麼灑脫，上課時打開書包，也不看學生，小心地講他的，不像別的老師，和學生至少對看一眼。我的畢業論文《論元代的戲曲》，是請他當導師的，我寫完交給他看，他改也沒改，就通過了。」

周作人沉靜的性格之中，也包含着清高、孤傲的因素，他有個筆名，叫「鶴生」，典出於日本留學時，蔣抑卮給他起的外號「鶴」。因爲在同鄉、朋友相聚聊天的時候，周作人常常是在一旁旁觀、沉默，不和大家打成一片，他對這個綽號看起來也能認可，否則不會在以後起了個「鶴生」的筆名。

不但對別人冷漠，對涉及自己利害的事，他也抱一種「居家和尚」式的淡漠。像家道中落後在親戚家避難時被稱爲「乞食者」，跑當舖遭人奚落，受到族人的欺侮等等，成爲魯迅一生不可磨滅的記憶，但對周作人則鮮有觸動，沒有多少感覺，甚至還覺得魯迅有點小題大做，過分敏感。他對親情和世事都看得很淡，時時要把自己從所屬的一切人事糾纏中解脫出來，遺世獨立，以獲得一種逍遙出世的自由和安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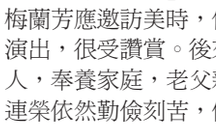
矛盾性和妥協性是周作人性格中的另一弱點。生活中，周作人幾乎無時不處於一種自我矛盾的狀態，優柔寡斷瞻前顧後難下決心。無名氏（卜乃夫）回憶在北大聽他講課的情景：「給我的最深印記，卻是躊躇不決。他未開口之前，總要用手抓頭，考慮一下，開口時則有點吞吞吐吐，輔助詞用得很多。正像他寫文章一樣，似乎恐怕一句話說出去，會成爲一顆炸彈。」他自己在早期所寫的《兩個鬼》中對自我內心的描摹更是形象，他說，在我們的心頭，住着兩個鬼，「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這是一種雙頭政治，而兩個執政還是意見不甚協和的，我卻像一個鐘擺在這中間搖着。有時候流氓佔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但是在我將眞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帶住，着即帶住！』……」日寇進入北平後，他忽而拒絕僞職，忽而揚言要做蘇武，最終還是做了僞教育督辦。在八道灣時，面對妻子信子的奢靡跋扈，他也看不慣，但信子一撒潑，或者借「癔」發瘋，他就退讓了，最後聽之任之了。一九四九年釋放後，他先是想去台灣，幾經猶豫後又改變了主意。

周作人最致命的性格缺陷是享受性。在八道灣時，三弟周建人大哥魯迅及母親先後搬出，家中只剩下信子、芳子、內弟重九及幾個小孩，這樣一個並不複雜的家庭中竟然僱有管家車伕傭人六七人，一切用品要東洋貨，生病則必須請外國大夫。如果說那時主要是信子在主持家政，那末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其時他的子女都已成家自立，人民文學出版社每月給他的預支稿費是四百元，比華羅庚周培源這些一級教授都高，相當於當時普通小職員工資的十倍（那時毛澤東的工資也不過四百零四點八元），再加上他的其他稿費收入，經濟上應該說是很富裕的。而他今天賣幾件古董，明天賣幾幅字畫。更有甚者，他向新結識的從未謀面的友人鮑耀明不斷訴苦哭窮，不斷向鮑討要食品，爲了一斤豬油一盒煎餅而感激涕零之態躍然紙上。雖然其時正值大陸普遍飢餓年代，但北京較之其他地區畢竟供應好一些，大陸百姓都在過着極其艱難的日子，唯獨他一再乞憐於人，眞有些斯文掃地。

周作人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和過失就是事僞投敵。那末他在這人生道路上的大是大非面前所做的選擇與他的個性缺陷有什麼樣的內在聯繫，我們也不妨做一點具體分析。當時，北平的學界名人紛紛南遷，面臨是在敵人的統治下做「順民」還是到大後方去爲抗日盡一個中國公民的責任，周作人當然不會沒有思考和抉擇。可以設想，如果南遷，他就要離開北平舒適的環境。到了大後方，生活上也一定會艱難得多，他肯定是不願受這樣扶老攜幼舉家顚沛之苦的；從另一方面看，信子是日本人，她對日本侵略中國是不會有切膚之痛的，或者毋寧說她非常願意留在北平繼續過往日悠閑富足的光景的，她其實已經在對自己的同胞佔領北平表示認同了，一有事情，她就在住宅門前掛上日本國旗，表示這裡是日籍住戶。周作人又是長期以來對她遷就曲從。所以，一個個性中充滿了依賴性、妥協性、貪圖安逸享受的周作人只能做出留在北平最終事敵的選擇，這是完全符合他性格邏輯的。

劉連榮拉車

鄧小秋



前些時，文藝界曾舉辦一次「十大孝星」的選舉，頗有現實的積極意義。在此想到前輩的京劇演員劉連榮，他如果在世的話，應該可算是「孝星」的合適人選。

劉連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花臉演員。他長期與梅蘭芳合作，在《霸王別姬》中扮演的項羽、在《宇宙鋒》中扮演的趙高、在《打嚴嵩》中扮演的嚴嵩等，都能表演得相當精彩，功力深厚，久負盛名。並且他爲人厚道，處事眞誠，從不與人爭角色，吃戲醋，始終保持着謙虛謹愼的美德。

劉連榮出身寒微，家庭貧困。父親以拉人力車爲生。他自幼在北京「富連成」科班習藝時，開始是以演武戲爲主，唱念並不十分突出。但他學藝極爲勤奮，常在背後練嗓，不遺餘力。有一天，學生們在劇場演完戲後，排隊回社。行至前門外珠市口大街，看見有一位人力車伕，年邁衰弱，腳步踉蹌，正在艱難拉車。走着走着，忽然跌倒在地。劉連榮看到以後，不顧社規，離開隊列，急忙奔到街心，挽起那位老車伕，自己代他拉車而行。原來，那老車伕正是他的父親。後來，蕭長華老師知道此事，非常感慨，認爲劉連榮是個大孝子。不僅不是違犯社規，而且還應該嘉獎。從此，便對他着意培養，逐漸讓他學演主要角色，每月的津貼也不斷增加。劉連榮深感老師栽培，刻苦學習，在花臉行當中，漸漸唱出名聲。有一次，他受梅蘭芳的邀請，演出《宇宙鋒》中的趙高一角，結果一炮而紅，從此就參加「梅劇團」，長期留下合作。一九二九年，梅蘭芳應邀訪美時，他作爲重要的配角，一起出訪演出，很受讚賞。後來，他雖然收入漸豐，孝敬老人，奉養家庭，老父親也不需要再拉車謀生，但劉連榮依然勤儉刻苦，保持本色。

養生先養德

程 艷

筆者看到這樣一個資料：美國耶魯大學和加州大學的專家對二千七百多人進行跟蹤調查，研究人員發現，一個助人爲樂、和他人相處融洽的人，其預期壽命顯著延長，男性尤其如此。相反，心懷惡意、損人利己、不容他人的人，其死亡率比正常人高一點五至二倍。這恰好印證了孔老夫子之言：「大德必得其壽。」孔子此語是不是他進行研究的結果，我們無從考證，但現代科學確實證實了這一點。

熱心助人、好善樂施、心胸寬廣者，由於他們常常給人以溫暖，因而使自己始終沉浸在他人的感激和尊敬的氛圍之中，進而不斷緩解了他們日常生活中不時遇到的焦慮和不安情緒，良好的心境使他們始終處於快樂和幸福之中。社會心理學家認爲，一個人心中充滿友善，多做好事，就會使自己內心充滿幸福和愉悅之情，呈現在眼前的時時刻刻都是陽光明媚的美好情景，會使自己對未來信心百倍，身體免疫力明顯高於一般人。

筆者的父親有一個老友，今年近八十了，十年前就查出了膀胱癌，可至今仍舊身體強壯。父親問他有何妙方時，他說：我的心情每天都是樂觀的，除了按時服從醫療外，我每天都給自己一個新起點的要求。我和以前一樣，堅持每天義務清掃公共廁所，別人有困難我會主動幫助，我們老兩口的養老金僅二千多元，但我已堅持了五年每月擠出四百元去支援兩名貧困兒童上學，我已經連續七年被公衆評爲「奉獻老人」。

聽說北京有一個老人叫王鏡，已八十五歲，幾年來靠撿拾破爛攢了五千元錢，他全部捐給了希望工程，幫助十五個孩子走進了學堂。有人不解地問他：您爲什麼不把錢存到銀行裡生利息？他說：我把錢捐給希望工程，利息比存在銀行裡大得多，我爲人修了德，心中愉快高興，如果這些孩子將來有出息，他們給國家創造的價值就是我的利息。

相反，那些缺乏道德涵養的人，易與周圍的人發生矛盾，常爲一件小事鬧得不可開交。還有那些貪污受賄、損人利己者，常常想方設法算計別人，以權謀私又要時時刻刻提防別人的暗算與報復，終日不得安寧，提心吊膽，情緒經常處於高度緊張與恐懼之中。長此以往，使身體各系統的功能嚴重失調，免疫力下降，從而導致疾病發生，正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樣的人即使服用靈丹妙藥也無濟於事，當然就不得其壽了。

養生須先養德，善良是養生的營養素。我們人人都應該積善行德，處處與人爲善，爲社會奉獻愛心，惟此，定能得到社會的尊敬和愛戴，進而實現健康長壽之目的。

從「粄」字話說客家點心

艾 京

查衆多現代漢語詞典和字典，有這麼一個字你肯定查不出來，這便是「粄」字。「粄」音博管反切，也即與「板」同音。客家人把糕點一律稱爲「粄」，由於此字較冷僻，於是有些專門研究客家文化的學者將「粄」字列入客家方言的範疇，有的學者乾脆把它說成是客家人生造的字。

事實上，「粄」字古皆有之。如宋朝出版的《玉篇》中就提到：「粄，補滿切，米餅」等字樣。清朝康熙年間所編的《康熙字典》中也將《粄》列入「米」部，並標音：博管切、補滿切等，並解爲「屑米餅」，由此可見，「粄」字不僅古老，同時更稱得上漢語中的活化石。

從「米」的「反」字在一些古籍書裡偶然還是可見到，如在南朝梁宗懍寫的《荊楚歲時記》一書記載當時三月三日的民間習俗：「是日，取鼠曲，蜜和粉，謂之龍舌粄，以壓時氣。」這些偏僻的字隨着時代的變遷已被淘汰。而「粄」字也只能在客家方言和論述客家文化的文章以及客家縣志裡出現。如在《民國新修大埔縣志》（一九三三年）就收錄了大埔民歌《打粄子》。

客家人的糕點，也即粄，在客家人的飲食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逢年過節，或逢家中有婚禮、添丁、滿月及長輩生日等喜慶的大日子，粄便成了不可或缺的美食。客家人的粄不僅是點心，有的還是可以充飢的食品。

例如，客家的粄類中最有名叫紅粄，由於和米粉（或糯米粉）時摻上紅麴，蒸出來呈紅色，而家裡添的又是男孩子，因此又叫添丁粄。但隨着時代的變遷，這種重男輕女的習俗也跟着消失了。

香港有一種名叫缽仔糕的糕點，客家人的粄中也有類似的糕點叫碗粄，小時在印尼，外婆不時地蒸碗粄給我們吃。碗粄的製法有其獨特之處，除令大米粉發酵外，外婆在粉糰裡摻上一定分量的酒釀。由於酒釀本身糖分高，因此蒸前毋須添加任何糖類。這種酒釀碗粄蒸後呈十字花，吃起來更有一股酒香味。而印尼的糕點有一種叫碗糕的（Kuwe Mangkok），相信是由中國人傳過去，由於和糰粉時摻上鮮椰漿或椰子紅糖，因此吃起來別有一番熱帶風味。

客家人有一種家喻戶曉的粄類點心，他們形象地稱爲拳頭粄，由於製法簡單省事，備受人們喜愛。拳頭粄是以麵粉爲主料的點心，由於煮出來呈拳頭狀，故名。先將麵粉以涼水和成稠糊狀，後以飯勺像山西老百姓家的撥魚兒那樣，在熱水裡煮熟，再放進客家特有的紅糖、薑蓉，煮片刻即可食用，講究一點的家庭，吃時摻上陳皮糖稀，在大冬天吃上一碗拳頭粄既驅寒又解饞。

在衆多客家糕點中，炸芋丸雖稱不上粄，它卻是客家人地道而又傳統的點心。在印尼的萬隆，製豆腐的作坊都以客家興寧人士爲主，那些家庭製作的客家糕點便在豆腐攤上託賣，其中必有炸芋丸這種點心。炸芋丸製作起來並不複雜，先將芋頭擦絲，加薯粉、鹽、普寧醬和薑蓉，團成乒乓球大小，炸作金黃色。

四年前到印尼舊地重遊，在雅加達的老同學，也是客家人，聽說我五十年沒吃過炸芋丸，於是便力邀我與妻到他府上就餐，並特地囑咐他家印尼廚師炸芋丸款待我們。女傭端上一大盤新炸出來的、熱辣辣的芋丸，頓時令我食指大動。